



从“义士”到“成功者”的思想史脉络

——对近代中国报刊中安德鲁·卡内基形象的文学性分析

邱月 胡雪翔

摘要:近代报刊中的人物新闻,在与时代拉开距离之后,呈现出文学性的特征,进而折射出传统文学研究容易忽略的思想史意义。以近代报刊中关于美国企业家、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报道为例,其媒体形象经历了从“义士”到“成功者”的变迁。近代报刊对卡内基的发现,源于其慈善事业的新闻效应,但在接受的过程中,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义”来解释慈善,过滤了慈善的现代意义。随着国人对卡内基认识的深入,媒体开始关注其作为“成功者”的人格魅力,体现出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于人生启蒙的重视,但忽略卡内基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整体贡献,也限制了近代中国对于变革和自强的想象。

关键词:近代中国报刊;安德鲁·卡内基;大文学;人物新闻;人物形象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3.02.019

收稿日期:2022-11-25

作者简介:邱月,女,四川广安人,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E-mail: qy630@126.com;
胡雪翔,女,陕西渭南人,文学硕士,四川大学出版社研究助理。

一 问题的缘起

“大文学”概念在中国初见于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强调与近代文学理论中的“文学”相比,中国传统社会中“文学”的外延更为广泛,包含的内容更加驳杂^①。新世纪之后,“大文学”概念再次在文学史研究中被提及^②,背景是长期指导文学研究的“纯文学”观日渐暴露出弊端:一方面,理论界的解构潮让具有本质主义的文学概念难以获得共识;另一方面,“纯文学”指导下的文学史研究日益失去参与思想史、精神史和社会史建构和讨论的能力,走向了自我边缘化。在西方文学理论界,对“纯文学”反思的时间出现得更早,如英国理论家伊格尔顿 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中,导言便对“文学是什么”进行了追问,不仅对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企图建构的本质主义的“文学性”进行了无情的解构,还对相对主义立场上认为“文学纯粹是一种形式性的、空的定义”的说法也进行了质疑^③。在该文中,伊格尔顿质疑文学概念的目的,还在于说明其“审美意识形态”的思想,但经过他的追问,让曾经风行一时的“纯文学”研究受到极大挑战。在“大文学”的视野下,曾经不属于“纯文学”范畴之内的新闻报道,在与时代拉开距离之后,呈现出如“想象”、“虚构”等文学性的特征,它们对于文学史的补充意义并不强,但对于比较文学和思想史研究却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①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 1918 年初版,后连续再版,至 1932 年共出版 17 版。

②主要倡导者及代表作包括:杨义《认识“大文学观”》,《文史哲三家畅谈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光明日报》2000 年 12 月 27 日,第 B01 版;杨义《通向大文学观》,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钱理群《关于 20 世纪 40 年代大文学史研究的断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 年第 1 期,第 1—23 页;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李怡《文史对话与大文学史观》,花城出版社 2019 年版。

③〔英〕弗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 页。

在中国,传记文学成为一种文学类型始于近代,此前的传记属于历史的范畴,至于传记中出现的“失真”现象,属于作传者的伦理和立场问题。到了近代,“人的文学”观念出现,基于塑造鲜活人物形象的考虑,传记的文学性受到重视,如鲁迅评价《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①的说法开始出现,也才有郁达夫、胡适等人倡导传记文学。概括起来,近代倡导的“传记文学”无非是强调历史与文学的结合,在历史的角度强调史实的准确,从文学的角度重视人物形象的鲜活,在突出文学性上,传记写作可以参照小说、戏剧的笔法,通过想象和虚构实现传记作品的生动与传神。在近代传记文学的标准下,近代传媒中的人物新闻,包括时事新闻中的人物介绍、人物专题报道和传记等,均达不到文学的高度。很多时事新闻中的人物介绍只是寥寥几笔,谈不上形象塑造,较有规模的人物专题报道、传记译介也限于篇幅,重在介绍事迹、传递精神,文学性并不强。然而,当近代人物新闻与时代拉开距离,成为一种历史景观之后,新闻中的主观性和文学性便显现了出来。

在今天看来,近代人物新闻中最具文学性的,莫过于对国外名人的报道和介绍。在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对异域文化的传播和接受,人物新闻是直观而有效的一种途径,通过人物事迹的译介,文化的异质性可以得到更直接的呈现,进而对接受者产生深刻影响。少年时代的鲁迅在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作名《进化与伦理》)中看到了赫胥黎的形象:“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②遂产生强烈的文化震撼感:“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③《天演论》传播的思想是进化论,然而其中不经意的一段人物描写,竟然对少年鲁迅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由于这种原因,近代报刊也非常重视人物新闻,有时它们作为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有时则以“副文本”的形式出现。以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非常著名的《新青年》杂志为例,其前身《青年杂志》选择的封面人物,如安德鲁·卡内基、本杰明·富兰克林、列夫·托尔斯泰、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等,在杂志中均有较为详细的传记介绍,这些人物都充当了文化传播的载体。而另外一些人物,如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则是因为其剧作受到欢迎而为中国读者所知,其个人传记只是剧作的附带信息。

相对中国人物新闻,近代报刊中的外国人物新闻因为时空距离和文化差异,客观上形成较大的“创作空间”,有编撰者对异质文化的不自觉误读,也有为了便于国人理解的有意附会,外国人物的形象最终会与他们在母文化中的形象发生较大“变异”。考察这个问题的价值体现为两个方面:从比较文学角度,通过新闻中人物形象的变迁,可以直观近代“文化旅行”的痕迹,相较于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以同时代人物为对象的新闻传记,可以直观反映一个国家对于“世界”的想象;另一方面,就走向世界初期的近代中国而言,对外国人物的创造性想象,折射出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之路上的思想轨辙。

本文选择美国企业家安德鲁·卡内基在近代中国(1840—1919)的新闻资料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其形象变迁及其文化渊源,从而检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追求的立场和选择。

二 安德鲁·卡内基在近代中国传媒上的“传记文学”

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 1835—1919),是与洛克菲勒、摩根等齐名的美国企业家和慈善家。卡内基在世界范围内闻名,一方面缘于他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家代表,其创办的钢铁企业富可敌国,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钢铁大王”;另一方面,他生前将90%的个人财富投入慈善事业,是现代慈善事业的践行者和开创者。除了实业和慈善,卡内基通过写作表达对政治和财富的理解,较有影响力的作品如:《胜利的民主》(*Triumphant Democrac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6)、《财富的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 The Century Company, 1900)、《当今时代的问题》(*Problems of To-Day*, Leipzig Bernhard Tauchnitz, 1908)等。卡内基的传奇经历和社会贡献,使其成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价值观的代表。卡内基生前,已经出现关于他的传记作品,如《卡内基钢铁公司的发展史》、《安德鲁·卡内基:从电报童到百万富翁》^④等。在其去世之后,又出现了更多版本的传记作品。

①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页。

②鲁迅《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306页。

③Bridge James Howard, *The Inside History of the Carnegie Steel Company* (London: Aldine Book Company, 1903); Alderson Bernard, *Andrew Carnegie: From Telegraph Boy to Millionaire* (London: C. Arthur Pearson, 1902).

由于卡内基的世界影响力,近代中国传媒很早就注意到他的事迹和传记,先后有《知新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经济丛编》、《湖南通俗演说报》、《大陆》、《万国公报》、《安徽白话报》、《国风报》、《进步》、《教育杂志》、《东方杂志》、《铁路协会会报》、《进步》、《中华实业界》、《青年杂志》、《银行周报》等报刊,通过新闻报道、人物传记、封面人物等形式介绍卡内基的生平事迹,构成卡内基中国传记的接受基础,也翔实记录了卡内基在中国接受的历时过程。这些报道中,以《青年杂志》转载卡内基传记作品最具影响力,该刊将卡内基作为创刊号封面人物,内刊彭德尊翻译《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①,将卡内基的传记翻译概括为十章,是中国近代报刊对卡内基生平事迹最为系统的介绍。《青年杂志》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杂志《新青年》的前身,由于这份杂志的影响力,卡内基在中国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因此也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值得重视的一个现象。

近代中国传媒对卡内基生平事迹介绍的方式较为多元,有类似《青年杂志》直接以传记形式介绍,其他如《新民丛报》“人物时评”栏目刊《美国豪富卡匿奇氏》^②,《湖南通俗演说报》刊湘东渔者撰《美国豪富卡匿奇传》^③等;有以“人生导师”的形式,直接传播其重要言论,如《大陆》杂志刊《美国富豪钢铁大王喀奈基翁之青年处世训》^④;也有以时事报道的形式介绍其事迹,如《知新报》“美洲近事”栏目刊《卡匿治请赎非岛》^⑤,《万国公报》“译谭随笔”刊《美国义举之总数》^⑥等。近代中国报刊对卡内基生平的介绍并非纯粹的“传记文学”,但各种形式均有“文学”手法参与,如在时事新闻中的卡内基人物形象,因信息来源有限,内容除了翻译之外,加入不少编辑的文学修饰和评论。再如直接将卡内基塑造成“人生导师”,虽然节录内容多出于卡内基的传记,但整体构思颇有“戏剧”的成分,且内容也有编辑靠想象添加的痕迹。即使如《青年杂志》刊登的卡内基翻译传记,译者也以节选的方式进行了大量改造,所形成的章节均出自译者手笔,以至于很难通过原文比对确定译者采用何种源版本。卡内基在近代中国传媒中的传记,不是通常文学史所定义的“传记文学”,有些甚至连纯粹的传记也算不上,但在特殊的语境下,它们又客观地呈现出“文学”的形态,包含如虚构、叙述等文学的手段,是特殊语境下的“传记文学”。

对于这样的“传记文学”,传统传记文学研究关心的传记伦理等问题,就不是本文关注的焦点,因为这些文学的创作者都是“无意”参与到卡内基形象的建构中。本文关注的焦点,是当卡内基以新闻主角或世界名人的形象出现在近代中国传媒时,中国知识界如何认识他的行为,进而产生了怎样的文化变异?

三 “义士”卡内基:文化过滤后的慈善

近代中国对卡内基的关注,始于其慈善和公益事业的新闻性,在对其慈善和公益事业进行译介时,近代报刊常用“义”和“义士”来进行概括和评价,体现出当时中国人对卡内基慈善事业的理解方式。1899年《知新报》对卡内基请赎菲律宾的报道,是近代中国传媒最早对卡内基的报道。报道标题为《卡匿治请赎非岛》,为“美洲近事”栏目下的简讯,内容译自“西三月二十三号日本太晤士报”,介绍了1898年美西战争后卡内基捐资以求菲律宾自治的事迹。报道内容有如此表述:“美国有义士卡匿治君,富厚之极,因不忍膏血涂弹火,又欲助成非民自立之大志,自愿捐资二十兆圆于美廷,以赎菲律宾群岛。”在报道结束之后,根据当时新闻报道的习惯,添加了译者的评论:“但卡匿治君,亦可谓绝代之轻财仗义者。使天下之排难解纷,人肯尽如卡君之为,当无不可解之仇也。”^⑦在这篇报道中,对卡内基个人及其行为皆用“义士”和“义”来形容。除此之外,1900年《清议报》在“外国近事”栏目下以《美人义举》报道了卡内基为皮提巴克工业学校共捐资一千六百万美元的消息^⑧。1905年《万国公报》在“译谭随笔”栏目下以《美国义举之总数》介绍1903年的美国慈善总数,其中特别提到卡内基个人捐款数额最多。近代中国报刊将“慈善”与“义”等同起来理解,也有人意识到两种

① 彭德尊《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号,第1—10页。

② 《美国豪富卡匿奇氏》,《新民丛报》1903年第29号,第79—81页。

③ 湘东渔者《美国豪富卡匿奇传》,《湖南通俗演说报》1903年第8期,“时事”,第1—3页。

④ 《美国富豪钢铁大王喀奈基翁之青年处世训》,《大陆》1905年第3卷第10号,“实业”,第4—8页。

⑤ 《卡匿治请赎非岛》,《知新报》1899年第85册,第13页。

⑥ [美]林乐知著、范祜述《美国义举之总数》,《万国公报》1905年第194册,第22—23页。

⑦ 《卡匿治请赎非岛》,《知新报》1899年第85册,第13页。

⑧ 《美人义举》,《清议报》1900年第67册,第12—13页。

行为背后文化背景的差异,如在《美国义举之总数》的文末,编者特别添加了如下评论:

古世振济之事,类发于其恻隐,自然之天良。不必皆有民我同胞之心也。自基督教之宗旨发明于世界,以人类同一天父之义为民我同胞之实据。秦越膜视之情形,日以减少,而各国义举之踊跃,日以增多。劝募者之心与捐输者之心,皆若为基督之仁爱所感动,而非有他也。^①

在此处,评论者已经注意到“义”与慈善背后文化根基的差异:“义”的背后包含中国儒家、释家的思想,如“功德”、“因果”等观念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用以形容个人修养;而慈善的背后有基督教文化的背景,包含着个人与人类的关系。这种发现在近代中国非常可贵,但评论者只是注意到两者差异,还不能通过术语直观对两者进行区别。

从今人的眼光来看,以“义士”或“义举”来概括卡内基的公益事业,主要基于对卡内基慈善事业的肯定,两者之间有一致之处,但文化差异更加明显。从语源学来说,中国文化中的“义”由“仪”衍生而来,重在强调个人修养,是君子之道。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我部》:“义,己之威仪也。”清人段玉裁注云:“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②意指合乎规范的行止仪容。汉代刘熙《释名》对“义”的解释是:“义者,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③所言之意,还是说“义”的行为合乎礼仪,让世界更加和谐。中国文化典籍通过更鲜活的事例,让“义”的内涵更为丰富且生动,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合乎礼仪规范。如《左传》“桓公二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④再如《史记·伯夷列传》:“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⑤两处关于“义士”、“义人”的记载,都与礼仪有关,“义”的行为是对诸侯王推翻宗室统治的非议,认为这种行为不符合周朝建立的礼仪制度。第二是在财物上的慷慨行为。如《通俗编》卷二十记:“(金石文字记)汉曹全碑阴‘义士某千,义士某五百’。义士盖但出财之人。今人出财布施皆曰信士。宋太宗朝避御名,凡义字皆改为信。今之信士,即汉碑所称义士也。”^⑥此处所说的“义士”便是为了公益慷慨捐财的人。

近代传媒用“义”来概括卡内基的行为,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卡内基资助菲律宾自治的行为,与中国古代义士对礼仪规范的维护较为一致,都是为了社会(世界)的正常运转而采取行动。其捐资的行为,与“义”所包含的慷慨捐财之意非常吻合。卡内基从事的慈善事业,正体现“义”的第二种内涵。所以,从翻译的角度,在国人对“慈善”、“和平”还不能全部接受的语境下,用“义”来概括卡内基的行为,可谓最恰当的选择。

但“义”也不能完全概括卡内基的行为,最重要的是,“义”不能将卡内基行为的现代内涵充分释放出来。作为现代慈善事业的奠基人,卡内基的慈善行为体现出资本主义文明的再发展,在经历过原始积累时期的残暴和掠夺之后,资本家开始重新思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以,用“义”来概括卡内基的慈善事业,卡内基的开拓精神被掩盖,且还呈现出保守的色彩。“义”在中国文化中受到尊崇,在于其散发出保守的贵族精神,“义士”所维护的社会秩序不是创新开拓,而是已经出现并消失的古代理想制度。再者,卡内基的慈善也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他的慷慨并不是简单地帮助别人,而是通过个人行为实现社会制度的完善,与中国古代的义士有很大不同。《万国公报》的评论者注意到卡内基行为背后的基督教精神,并认识到它与中国“义”文化背后儒家精神的不同,这种看法局部呈现了两者的文化差异,并没有捕捉到卡内基“义举”的时代精神。

四 “成功者”之后的文化发现与缺省

自1903年《新民丛报》“人物时评”栏目刊《美国豪富卡匿奇氏》之后,近代中国传媒开始关注卡内基的传记资料,类似的文章有:《美国豪富卡匿奇氏》、《美国富豪钢铁大王喀奈基翁之青年处世训》、《美国富豪楷那基氏》、《钢铁事业发达小史》、《美国实业界十大王:钢铁大王卡匿奇》、《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杂

①〔美〕林乐知著、范祎述《美国义举之总数》,《万国公报》1905年第194册,第22—23页。

②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33页。

③刘熙《释名》,《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经部第78册,世界书局1985年版,第546页。

④左丘明《左传》,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2页。

⑤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23页。

⑥翟灏《通俗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16页。

纂：美钢铁大王卡内基传》^①等。这些文章多数并不算传记文学，对卡内基生平的介绍主要集中在慈善的个别事迹上，只有如《美国富豪钢铁大王喀奈基翁之青年处世训》、《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杂纂：美钢铁大王卡内基传》等文章，较为详细地向中国读者介绍卡内基的生平及人格特征。

对卡内基完整生平及人格特征的关注，表面看来，是近代中国传媒对卡内基兴趣的提升，而就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逻辑来说，代表了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化理解的深入。在零星报道卡内基事迹的阶段，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文化的“猎奇”心态，无论是卡内基帮助菲律宾自治，还是他散财做慈善，对于当时的中国媒体而言，只是叹为观止，但并不能充分了解背后的文化内涵。而对卡内基生平和人格的关注，至少在两个方面代表了中国知识界的转变。第一，改变了对“商”的看法。传统中国对于个人职业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如《管子·小匡》的“四民”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②此处的“士农工商”不仅是并列结构，也是等级制度，“商”处于最后一等。在中国关于社会分类的“三教九流”说中，虽然版本不一，“商”也是较为末流一类。近代中国传媒将商人卡内基个人事迹作为关注点，说明知识界已经打破了这种固有的职业偏见。第二，重新审视个人的价值问题。中国文化中的“史传”传统，也刺激个人在道德或事业上取得成功，但中国文化总体强调“克己复礼”，并不过分突出个人的价值和意义。在卡内基的生平中，无论是白手起家成为“钢铁大王”，还是慷慨散财开拓慈善事业，都是以个人的力量造福社会，推动文明进步。而就卡内基个人所传递的文化讯息而言，如果不关注他整个人生历程，其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开拓意义并不能得到彰显。卡内基人生可分为两个阶段，其白手起家创富阶段，体现出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精神，此时的卡内基精明强干，甚至表现出“强盗”的特质；而其晚年致力慈善、慷慨散财，又表现出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完成之后，个体对于社会公平和完善的关注。卡内基的历史价值，就在于他是资本主义文明向更高程度发展的开拓者。

然而遗憾的是，近代中国报刊上卡内基传记的作者（翻译者），并不能充分把握卡内基生平的整体性，特别是其后期转向慈善的举动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开拓意义，反而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其前半生艰苦创业的经历上。《大陆》杂志所刊《美国富豪钢铁大王喀奈基翁之青年处世训》（后简称《青年处世训》），是近代报刊侧重对卡内基人格魅力进行展示的文章。文章分为五节：“青年之心中不可无理想之英雄”、“青年抵抗诱惑之自卫法”、“自力自活青年之可贵哉”、“完成事业之道”、“青年之失败不足介意”，写法是以卡内基的口吻告诫青年，内容多来自卡内基的一些言论，其中也夹杂不少编者杜撰的内容。如开篇卡内基说：“青年诸君，吾人之处世也，文学之感化，史传之鼓吹，均不可轻视者也。”^③其中的“史传”可以泛指人物传记，但它在中国文化中内涵更加特别，传递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与卡内基成长的文化背景不符。该文将卡内基塑造为人生导师，依据的是其事业上的成就，篇名为其冠以“钢铁大王”的头衔，与其“处世训”的权威性之间具有因果逻辑联系。其实，即使从中国传统价值观出发，卡内基的成功也具有多重解读的空间，建功立业固然是成功的重要标准，奉行义举依然是儒家追求的人生理想，但该文并没有对近代媒体中津津乐道的卡内基“义举”有太多关注，这反映出部分媒体人对卡内基关注点的转变。

从文化背景上来说，《青年处世训》体现出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于“进化论”思想的关注。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念的刺激下，知识界对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体现出的勇猛、专注和进取的精神表示出较强的兴趣。在卡内基的“青年处世训”中，如树立理想、抵抗诱惑、自力自活，以及坚韧不拔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能找到相应文化基因。但正如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所言：“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④由于文化发展中自我变异，很多优秀文化并没有得到有效弘扬，进而在近代需要异质文化的输入，

①《美国富豪卡内基氏》，《经济丛编》1903年第27号，第1页；《美国富豪钢铁大王喀奈基翁之青年处世训》，《大陆》1905年第3卷第10号，“实业”，第4—8页；《美国富豪楷那基氏》，《东方杂志》1911年第8卷第4号，第29页；〔美〕喀生氏原著、正则述略《钢铁事业发达小史》，《进步》1914年第6卷第6号（第36册），第1—16页；卢寿籛《美国实业界十大王：钢铁大王卡内基》，《中华实业界》1914年第1号，第1—11页；彭德尊《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号，第1—10页；《杂纂：美钢铁大王卡内基传》，《银行周报》1919年第3卷第31号，第52页。

②《管子》，房玄龄注、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页。

③《美国富豪钢铁大王喀奈基翁之青年处世训》，《大陆》1905年第3卷第10号，“实业”，第4页。

④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北京言实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进而激发其生命力。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将商人卡内基视为近代青年的导师,已经说明中国人的价值观开始走向多元,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的标志之一。

《青年杂志》载《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后简称《卡内基传》)是近代中国传媒对卡内基传记介绍最为完整的一篇。译者彭德尊从卡内基传记里节译出十章,穿插个人评论,内容涵盖了卡内基完整人生经历。与《青年处世训》相比,《卡内基传》因为属于译作,传递了卡内基成长过程中更多历史细节,如其渡美过程、创业细节、散财之法和慈善事业等,接受者可以获取如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自由竞争的真实状态以及资本家的价值观等文化信息。如果说《青年处世训》中的卡内基与晚清“清流派”知识分子的形象略显含混,《卡内基传》中的卡内基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资本家。此外,《卡内基传》对卡内基成功的定义,并不单纯依据实业的成功,还注意到卡内基的财富哲学、慈善事业和个人理想,由此打破了“成王败寇”的事功思想,使卡内基更具有人生启蒙的价值。两者的变化反映出中国近代知识界的思想变化,同时针对“青年”读者,《青年杂志》并不将他们视为训诫的对象,而是考虑他们人生价值的独立性和完整性。通过这种变化,卡内基人生经历中所包含的开拓性和进取性得到更充分呈现,从而使卡内基作为“成功者”的示范意义更具有开放性。

正如译者彭德尊为《卡内基传》设置的价值框架——“艰苦力行之成功者”,《青年杂志》对卡内基形象的塑造,依然强调其早期艰苦创业的精神。这种有意的择取固然可以在近代中国的社会现状中找到依据,如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追求民族复兴的共同理想等,但对其后期公益思想的忽略,也让中国青年失去对卡内基自主评判的机会。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角度来看,缺省也是文化变异的重要表现——有意或无意忽略源文化中的一些信息,虽然被传播的文化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文化的整体性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卡内基的商业成就而言,虽然“艰苦力行”是重要的精神保证,但如果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出现的特殊际遇,他也无法达到世界钢铁大王的事业高度。近代中国经过洋务运动也开始注重实业,也产生了一批“艰苦力行”的民营企业家,但由于制度和文化等多方面的缺陷,无人能够复制卡内基的成功,这在一个侧面也说明“缺省”造成的文化遗憾。

总体而言,近代中国传媒对卡内基创业精神的重视,与此时中国追求民族自强的时代节点有关。自晚清开始,中国陷入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自强”成为时代的主题,近代中国发生的变革,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莫不以“自强”为旗号。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造一个包含新制度、新思想的现代国家是知识界关心的话题,而如何使社会变得完善则是下一阶段的命题。如此,卡内基从苏格兰到美国“艰苦力行”的精神成为知识界关注的对象,并不惜将之作为鼓舞青年一代的精神资源。

五 结语

卡内基在近代中国被接受的过程,是文化旅行的一个标本。他首先以“时事”的形式进入中国,所传递的文化信息更接近他在西方世界的文化影响力:一方面他在事业上的巨大成功代表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另一方面他对于慈善事业的巨大贡献,也标志着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这也是近代传媒最为关注的两个新闻点。在此阶段,中国知识界对其文化价值的接受出现接受障碍,不能准确把握其文化内涵,对其事业的巨大成功只是表现出“惊叹”,对其慈善事业也只能通过中国文化中的“义”进行理解,产生明显的文化误读。随着国人对卡内基理解的深入,卡内基的人格魅力开始受到媒体关注,从而进入中国知识界对卡内基接受的第二阶段。在此阶段,卡内基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慈善事业反而被忽略,其如何取得成功成为知识界着力宣传的焦点,从而形成近代中国特殊的关注角度。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角度,近代中国传媒对卡内基关注点的变化,体现出知识界更强烈的主体意识,但忽略了卡内基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整体贡献,限制了近代中国对于变革和自强的想象。总体而言,卡内基形象在中国社会的变异史,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部分,反映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心路历程,无论是文化猎奇阶段的茫然,还是有意选择的缺省,透过文化变异都能看到国人的精神成长史。

[责任编辑:唐 普]